

資本主義復辟乎？經濟改革乎？

呂律

壹 引言

現在匪俄雙方的報刊正在為蘇俄所推行的經濟新體制而大肆爭論，毛共的宣傳一口咬定蘇俄在實行資本主義復辟，蘇俄力辯這是經濟改革。

在進行討論匪俄雙方的爭論之前，先將下面幾個時間內所發生的事略提一個大概，對於了解問題將大有幫助：

一、自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真理報」發表李柏曼教授「計劃、利潤、獎金」一文至一九六五年九月俄共中央全會討論經濟改革案之前，蘇俄在將近三年的時間內會為改造它的經濟制度、解除它的經濟危機，展開一個全國性的大討論。西方的經濟學人在此期間發表議論者，大有人在，然而反對黑魯曉夫修正主義的共匪經濟學人和報刊，却并無什麼直接的尖銳的批評和攻擊。

二、俄共中央九月（一九六五年）全會通過所謂「改進工業管理、完善計劃工作和加強工業生產經濟刺激」案——即一般所謂「經濟改革案」後，命令規定自一九六六年正式實施，這件事在共產世界中可以說是一件重大的修正，但是毛共的宣傳一直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匪黨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公報發表為止，仍無直接表示。這種令人費解的情況，自公開「奪權」以後，從大字報的許多攻訐資料中，可以找到充分的答案。

三、毛共十一中全會前後到本年三月這段時間，在毛共的宣傳方面所表現的一切，頗堪玩味：最初，「人民日報」連續於八月八日，八月十二日和八月十四日發表攻擊孫冶方的文章，每天都是佔該報第五版一版的地位。孫冶方曾任匪「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據「紅旗」雜誌一九六六年第八期社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指出：「在經濟學界，孫冶方等人提出一整套修正主義謬論，他們反對毛澤東思想掛帥、政治掛帥，主張利潤掛帥、鈔票掛帥。他們妄圖改變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把社會主義企業變成資本主義的企業。」不過，攻擊孫冶方走修正主義路線，主張利潤掛帥、鈔票掛帥的風頭，起來時雖然看來頗為驟急，但是并未持續下去，在八月十四

日以後就很少再提了。從這裏我們不難了解，毛共的「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是以「奪權」為目的，在「奪權」的活動受到阻礙不能暢所欲言時，他們的慣技是採取迂迴的戰術，暫時放棄直線的正面的攻擊。

四、自本年三月十二日至五月底為止，不但反利潤掛帥的風浪又起，并且從間接的指桑罵槐以孫冶方等人作代罪羔羊的方式，轉為直接的指名攻擊方式。在這兩個多月當中，僅以「人民日報」而論，就連續發表了「蘇修的階級鬥爭熄滅論可以休矣」、「蘇修加緊推行徹底復辟資本主義的新體制」、「盧布掛帥」、「揭穿偽善者的鬼話」、「蘇修在農業中加緊復辟資本主義」、「蘇修的工業新體制是資產階級特權所有制」、「蘇修極力推行新體制全面復辟資本主義」、「利潤掛帥的經濟新體制」、「如此獎金制度」、「蘇修販賣的是假共產主義的黑貨」等十篇反對蘇俄經濟新體制的文字。

毛共在將近四年的時間內，對於蘇俄的經濟新體制，有時保持緘默，有時採取間接指桑罵槐的攻擊，最近突然轉變採取直接的正面痛罵，諸如此類的現象，絕不是偶然的，它們都反映着共匪內部政權鬥爭的消長，同時，也不能否認最近突然而起的攻擊，與毛共經濟上的失敗有密切的關連。

貳 毛共的攻擊與詆毀

毛林集團御用下的宣傳機器對於蘇俄經濟新體制的攻擊，概括的可分為間接與直接兩種。

間接的攻擊以孫冶方等為代罪羔羊，尤其是以孫冶方本人為衆矢之的。從去年八月八日至十四日指名攻擊孫冶方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毛共對蘇俄經濟新體制的態度為以下數點：

一、指孫冶方會提出一個「反革命的修正主義經濟綱領」，這個綱領包括下列各項：①在企業和整個國民經濟中實行「利潤掛帥」，反對「無產階級政治掛帥」；②實行「企業獨立自治」，反對「國家的集中統一領導」，也就是從根本上變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為資產階級所有制；③強調「新價值規律論」，也就是要社會主義經濟聽從「價值規律」的擺佈，否定「國民經

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作用。他們認為孫治方這三項主張集中在一點上，就是要把社會主義經濟「和平演變」為資本主義經濟。

二、指孫治方所以要竭力反對政治掛帥，「其用心昭然若揭，他要以利潤、獎金為釣餌，以物質刺激為手段，瓦解工人階級的革命意志，妄圖把工人都變成斤斤計較眼前私利的人」，而把「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世界革命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一古腦都拋棄掉，為孫治方之流的資本主義復辟準備條件。同樣，就整個企業來說，認為孫治方等無非要讓利潤來調節企業的生產，使每個企業都圍繞着利潤團團轉，把「社會需要」、「國家計劃」、「黨和無產階級的政治任務」全都拋到九霄雲外，把社會主義經濟導向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導向自由競爭。

三、指孫治方主張實行「企業獨立自治」，是他「反革命修正主義經濟綱領」中一項根本性的措施，「集中暴露了這個綱領的反動本質」，「集中暴露了孫治方陰謀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野心」。他們認為孫治方以改進管理體制為幌子，主張實行「企業獨立自治」，使每個企業在原有資金範圍內有獨立處理一切經濟事務的職權，即①企業有權自行制訂生產計劃，自由擴大生產，國家祇掌握利潤指標，生產計劃由企業根據市場需要自行制定；②企業有權自由支配企業的折舊基金和自由買賣固定資產，允許企業任意擴大或縮小自己的生產能力，自行決定技術改造的方向；③取消國家的物資計劃調撥制度，由企業通過「合同制」自行安排供銷關係，產品自由買賣，自由競爭，國家不必過問。

四、指孫治方宣揚「新價值規律論」，主張用「價值規律」來代替「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實際上就是孫治方所擺的迷魂陣，是故弄玄虛，「就是以利潤主宰一切」，「就是物質刺激」，「就是金錢萬能」。他們認為：價值規律對社會生產的調節作用，是以市場經濟為前提，而不是以計劃經濟為前提，價值規律對社會生產的調節作用，實際上也就是利潤對生產的調節作用，說穿了，孫治方是為他的「利潤掛帥論」和「企業獨立自治論」提供理論根據。

以上就是毛共宣傳所透露出來的孫治方的「反革命修正主義經濟綱領」，也就是所謂「孫治方精心設計的一幅復辟資本主義的藍圖」。他們認為按照這張藍圖，「社會主義國家就成為資本主義的大老板」，「企業就成了國

家和廠長、經理合夥開設的合營公司」；按照這幅藍圖，他們認為「黨的領導沒有了」，「無產階級專政沒有了」，「國家統一的國民經濟計劃沒有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方向也沒有了」。

最後毛共的宣傳指出：孫治方的主張，是俄共第二十次大會以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修正主義「逆流」在共匪經濟中的一種反映。據說：一九五六年孫治方在訪問蘇俄期間結識了黑魯曉夫的一些「修正主義謀士」，一見之下就崇拜得五體投地，回去以後，會一再稱頌「現代修正主義」，說道從莫斯科得到許多精湛的說明和啓示。一九五九年以後，據說他又去訪問兩次，回去以後在所寫的報告中建議借鏡蘇俄經濟界克服教條主義的作法。俄共第廿二次大會以後，李柏曼提出以利潤調節來代替計劃管理的建議，孫治方會公然聲稱他自己的觀點比李柏曼更徹底。因此，毛共的宣傳指名罵他是「盤踞在經濟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急先鋒」，「是一條現代修正主義的忠實走狗」。

這種指桑罵槐的間接攻擊，似乎是到本年三月已完全告一結束，接上來就是正面的直接攻擊了。

根據我們上述毛共宣傳自本年三月初至五月底刊布的十篇文字，可以將現階段正在推行中的直接攻擊歸納為以下幾個重點：

一、指蘇俄自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起推行的新體制，是復辟資本主義，一口咬定此項新體制的核心，「就是盧布掛帥」，「就是唯利是圖」，「就是把利潤原則作為一切經濟活動的最高原則」。所以他們認為蘇俄領導集團是在「徹底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徹底葬送十月革命成果」，「徹底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步驟」。他們所持的理由是，追求利潤是資本主義的絕對法則，現在蘇俄把這一套搬了過來奉為金科玉律，以利潤作為生產的基本動力，讓企業按市場行情調節生產，用自由競爭代替計劃經濟，這就是說「他們明明搞的是資本主義」。

從毛共的宣傳資料看來，似乎蘇俄領導層搞經濟新體制已到了狂熱的程度。——從黑魯曉夫一直到布里茲涅夫、柯錫金，他們上台以後，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復辟資本主義」，以致蘇俄的「工礦企業逐步蛻化為資本主義企業」，「集體農莊逐步蛻化為資本主義的農場」，「文化藝術也散發着腐朽墮落的資產階級臭味」，「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特權階層已經形成」，而蘇俄

的統治集團就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代理人」。

二、關於蘇俄進行改進工業管理、完善計劃工作，加強工業生產的經濟刺激，毛共宣傳的攻擊特別尖銳刻毒。他們認為這個在工業企業中「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計劃」，是早在黑魯曉夫統治時期就提出來了。為進行輿論的準備，在蘇俄領導階層的鼓勵下，蘇俄經濟學教授李柏曼於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在「真理報」上提出一個「以利潤為基礎」的改革建議。此項建議一經刊布，蘇俄報刊就繼續發表大量文章，竭力加以吹噓。接着，蘇俄領導階層不顧一切在「試驗」的幌子下，開始在一些輕工業企業裏推行這種「復辟資本主義」的新措施。迨布里茲涅夫與柯錫金上台以後，迫不及待的就大大加速在國民經濟各部門中「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步伐。——在工業及其他國營企業中緊鑼密鼓的推行「徹底復辟資本主義的新體制」。

據毛共的宣傳指出，蘇俄新領導在一九六四年底就決定把黑魯曉夫在兩家縫紉公司（註一）中試驗的產銷單位「直接訂貨制」推廣到四百家輕工業企業；一九六五年初，在重工業部門開始推行以利潤為主要指標的作法，隨後又向汽車運輸、貿易、飲食業和食品工業等部門推廣；同年九、十月召開俄共中央全會和最高蘇維埃會議，頒布「社會主義國營生產企業條例」，把試行的一套「向資本主義倒退」的措施制度化，制定出一個「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的新體制」，以黨的決議和政府法令的形式在全國範圍內普遍推行。

毛共的宣傳強調蘇俄此項工業改革，是「赤裸裸的把資本主義的利潤原則當作勞動、一切經濟活動的火車頭」，因為柯錫金提出，要把利潤當作引導企業提高生產效率的最好辦法，當作評價企業貢獻的重要標準和進行物質刺激的源泉。被毛共認為大逆不道的，是根據此種「利潤掛帥指導原則」，蘇俄決定取消原由國家下達的一系列重要指標；「為了給企業開闢更多賺錢的門路，大肆鼓吹廣泛的發展供求企業之間的直接聯繫」，無異就是按照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法則辦事。除此之外，還賦與企業領導人更大的和更多的特權，在完成上繳利潤的前提下，他們有權自行處理企業的一切事務。

三、毛共的宣傳指出，蘇俄這一套「以利潤掛帥為核心」的工業管理新體制，在推行中遠遠超出了工業部門的範圍，實際上已擴大到一切國營企業，關於這一點，在「社會主義國營生產企業條例」中已有明確規定，不僅僅

用於國營工業企業，而且也適用於建築業、農業、運輸和郵電企業。

關於蘇俄農業中的經濟改革，毛共的宣傳在最近會一再加強斥責蘇俄領導人此項發展趨向，指為「日益加緊在蘇俄瓦解和破壞社會主義農業制度」，「在蘇俄農村中徹底實行資本主義復辟」。

毛共的宣傳說，早在一九五五年的時候，黑魯曉夫就攻擊當時所行的農業計劃制度是「官僚主義的」，他改變了那種計劃制度，確定國家每年祇向全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下達征購農產品的計劃，生產計劃則由農莊和農場自行決定；一九五八年，黑魯曉夫又取消集體農莊向國家義務交售農牧產品的制度，而由農莊向國家出售和由國家向農莊征購農牧產品；一九六三年，在黑魯曉夫的提倡與鼓勵下，蘇俄展開李柏曼建議的大討論，不但為工業、也為農業的改革作了輿論的準備；蘇俄新領導上台以後，曾召開不祇一次的俄共中央全會和最高蘇維埃會議，逐步完成新體制的立法，同時蘇俄新領導在最近兩年會通過一系列決議，決定在蘇俄農業中實行以贏利為主要經濟指標的農業新體制。

一九六五年底，據毛共的宣傳說，蘇俄就開始在蘇俄一些國營農場進行新體制的試驗，今年四月中旬又通過「關於在國營農場及其他國營農業企業逐步改行全面經濟核算制」的決議，決定把這種新體制推廣到三九〇個國營農場和其他國營農業企業中。毛共認為蘇俄最近在農業方面所採取的新措施，是「倒行逆施」，是「使蘇俄農業走上自由競爭、自由經營、唯利是圖的資本主義道路」。

四、毛共的宣傳除對蘇俄整個新體制及工業中和農業中的經濟改革，特別強調這是走向資本主義復辟外，並且就新體制中的一些特點，如利潤原則、提高企業獨立自主性、強調獎金制度、重視市場經濟等分別予以抨擊。譬如：

關於利潤原則，他們指蘇俄為追求利潤決定取消原由國家下達的一系列重要指標，現在祇給企業規定「賣多少錢」（即產品銷售額）、「賺多少錢」（即利潤和贏利率）、「上繳多少錢」，至於「生產什麼」、「生產多少」、「產品成本」和「勞動生產率」等，均由企業自行決定；更有甚者，為了增加追逐利潤的興趣，蘇俄還決定把剩餘作為進行物質刺激的源泉，用所得的利潤提成建立每個企業自己的「生產發展基金」、「物質獎勵基金」及

「文化措施和住宅建設基金」等等。「實際上是利用利潤原則，求進一步加深不合理的分配關係。」

關於提高企業經營自主性問題，毛共的宣傳認為，賦予企業領導人更大和更多的特權，在完成上繳利潤的前提下，他們幾乎有權獨立處理企業的一切生產、財務和人事問題，尤其是按照「企業條例」規定，企業有權「佔有、使用和支配」企業中的一切財產；有權出售多餘的設備、運輸工具、原料、材料和燃料；有權出租暫時不用的廠房、倉庫、設備和運輸工具；有權自行註銷陳舊的固定資產；有權「用自己的資金搞計劃外的基本建設」和「用自己的材料接受計劃外的訂貨」，並且規定，企業領導人不經委託即以企業名義辦事，它有權確定和改變職工的工資級別和獎金；有權拒收、解僱和處罰工人，它可以自行批准企業的結構和編制。在這種情形下，毛共的宣傳認為，「計劃經濟已經成爲一句空話」了。

關於市場問題，毛共的宣傳一口咬定蘇俄「廣泛發展供求企業之間的直接聯系」，是抄襲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則，進行自由競爭，特別對於農村中集體農莊的自由市場提出尖銳的抨擊。他們認為「蘇俄千方百計進一步發展自由經營和自由市場」是「全面徹底復辟資本主義」。

關於獎金問題，毛共的宣傳指斥蘇俄企業中實行獎金制度，被視爲刺激生產積極性的興奮劑，這是「盧布掛帥」的標誌之一。這個辦法實行以後，流弊叢生。「什麼事情都可以撈獎金，連沒有完成的計劃、虛報的「合理化建議都可以發獎金」；「無緣無故發獎金的事，到處都有」；「爲了追逐獎金，荒誕百出，不但虛報工作時間、欺騙朦朧，而且爲了不使人泄漏內幕，根本沒有參加工作的人也發獎金。」

毛共宣傳在開始直接攻擊蘇俄的新體制以後，對蘇俄的詆毀不一而足，事實上我們不能而且沒有必要全面都談到，祇能作重點的扼要提出。同時，我們相信，毛共宣傳對蘇俄經濟新體制的攻擊將會繼續發展下去，新的花樣、新的論點將會繼續推出，所以，可能要在另一篇報告中繼續談這個問題。

叁 蘇俄的回擊與表白

當共匪對蘇俄經濟新體制停留在間接攻擊的狀態中時，蘇俄未動聲色

資本主義復辟乎？經濟改革乎？

，待共匪對蘇俄的經濟新體制轉入直接攻擊後，才開始回擊與表明，但是蘇俄在本年三—四月間對共匪所作的答覆，仍舊有相當間接的性質，譬如莫斯科廣播所播出的「窮是不好」、「蘇俄的政策有利於人民」、「列寧的物質鼓勵原則」、「關於經濟利潤的誹謗」、「介紹蘇俄的新經濟改革」等五篇報導、馬克思列寧主義講座和連續談話，就是這個時期的代表。自四月下半月起，蘇俄的宣傳雖然已微露轉趨積極之意，在這個時候，莫斯科廣播會播出「蘇俄工人回答四月十一日人民日報的反蘇文章」和「人民日報四月十一日所載反蘇新濫調使蘇俄人民從心裏感到憤慨」的報導，仍舊保持相當的忍耐。

但是，因爲毛共宣傳對蘇俄新體制的攻擊已經到了使蘇俄感覺忍無可忍的地步，於是「真理報」於五月廿九日發表一項聲明：「蘇俄的經濟改革不是削弱而是加強經濟的計劃原則」，「那些說社會主義在接近資本主義的西方經濟學家的說法，是指天說地」。「真理報」解釋說：「此次的改革祇是縮小了計劃指標的範圍和擴大企業的經營自主性，工業的主要任務繼續保存，經濟的主要目的同過去一樣，是滿足社會及其成員的需要，這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經濟上的重要差別，資本主義最後的目的是增加利潤。」

自此以後，蘇俄的宣傳對毛共宣傳的攻擊，已不再容忍，也針對毛共宣傳的攻擊提出尖銳的回擊和表白：

一、關於蘇俄推行的經濟新體制問題，蘇俄宣傳發表李柏曼教授的談話說：「蘇俄現在大約有五萬個工業企業，它們生產數百萬種構造不同的和名稱不同的產品，中央機關能够并且應當規定關於重要的產品品名表，以及發展經濟各部門的總比例、速度和個別關係，但是必須指出，爲烏茲別克斯坦的人民規定應當做什麼樣的衣服，或者爲生活在頓河地帶的養路工人，規定應當爲他們做些什麼樣的鞋子，這是不合理的和不可能。」

李柏曼又說：「計劃和合同，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是經營方法不可分割的兩個部份。在沒有合同制度的情況下，計劃會脫離生活，并會成爲官僚主義的現象；而在沒有計劃制度的情況下，合同會引起無組織的狀態和混亂的現象。」

李柏曼教授反駁毛澤東的宣傳企圖使人們相信，蘇俄企業在擺脫一切計劃指標以後，開始在市場上自由賺取利潤，并且邁向剝削與奴役。他說：「

在蘇俄，利潤不是唯一的指標，而是計劃最重要的指標之一。」

李柏曼說，蘇俄現時所實行的與毛共不同，毛共竭力鼓吹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貢獻的勞動要多，要求的勞動報酬要少，蘇俄是二者併重，他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蘇俄經常保持『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這意味着誰的勞動給社會帶來更多和更好的福利，誰就會從社會那裏得到更多的勞動報酬，而把一部份利潤作為獎金發給成績優異的工人、職員和領導人，這種按勞分配的形式，就是為了表揚勞動主動性和勞動的創造性。」李柏曼進一步說：「蘇俄按照新制度工作的企業，儘管在利潤中撥出巨額的獎金（不超出工資的三〇——四〇%），但是這些獎金『不會用來買小商店和小型工廠』，『不會為了自己的私利而剝削別人。』

二、關於蘇俄工業中的經濟改革，「真理報」在五月廿九日發表莫斯科市黨委書記柏利索夫一篇文章，介紹該市工業實行新改革的情況，也就是回擊毛共宣傳的「誹謗」。據柏利索夫在其報告中指出：莫斯科去年有七八個工廠按新體制工作，它們都是莫斯科的大企業，它們生產的產品佔莫斯科所有企業總產值的四分之一。這些企業裏的主要指標，增加的速度比首都工業的平均增加速度快一倍左右，產品生產率 and 產品的銷貨量增加了一〇%，勞動生產率增加了四·二%，利潤提高了二·一%。於是，柏利索夫下一結論說：「新的經營制度是及時的，並且是起良好作用的。」何以這些大企業在改行新體制之後，會有這樣的成績，據柏利索夫解釋：「由於改用新體制之故，使很大一部份工作人員在心理上、以及在他們對待自己工作的態度上，發生了良好的變化，他們的積極性提高了，每個人對於個人勞動結果、以及對整個集體勞動結果的關心也提高了。」

三、關於在農業中實行新體制的問題，蘇俄農業科學院院士卡羅姆教授應莫斯科電台之邀，發表三篇連續談話，以說明新改革對國營農場的好處。他說：改革的實質在於保存着國家的總計劃和中央對經濟的領導，而同時向企業提供更大的權利，企業利用這些權利，在更少的耗費勞動和資金的情況下，獲得更多的產品，為了鼓勵工作成績好的集體，規定一部份超額積累留給國營農場，這種超額利潤以補充獎金和其他物質鼓勵的形式，發給工人

卡羅姆院士說：蘇俄現有一萬二千多個國營農場，在國家的農業中所佔

的比重相當大，它們出產全國三分之一的穀物、四分之一的牛奶和一半以上的肉類。但是一萬二千個國營農場經營的結果并不完全一樣，有的工作很好，另一些工作較差，這是因為勞動組織有問題，組織較好的結果一定好，否則就較差。現在政府決定為國營農場創造同樣的條件，為了對農業了解甲場或乙場的工作情況，實行經濟核算的原則，以期它們都成為贏利的國營企業。

接上來，柏利索夫似乎為反駁毛共宣傳的「惡意攻擊」，對國營農場的贏利問題解釋說：利潤是擴大生產、改善人民生活的源泉。由於留在國營農場裏用作發給工人獎金的一部份利潤，是從總利潤中扣下來的，因此就會產生努力把工作進行的更好、更有效、更明確和更有組織的核算，「毫無問題將會有更多的產品提供給國家」，「也祇會有利於國家，不會有害於國家。」

最後，卡羅姆院士強調指出：儘管此項政策對社會主義經濟帶來很多好處，但是毛澤東的宣傳却反對此項改革，詆毀它的目的，斷言要達到改革目的的手段是資本主義的，說蘇俄在實行資本主義復辟。他說：「經濟核算和物質刺激進一步的被利用起來，在社會主義國家當一切生產手段是全民的財產時，這個措施祇會導致經濟進步，不可能有任何資本主義和任何資本家的。」

四、蘇俄為答復毛共宣傳「利潤掛帥」的攻擊，莫斯科電台特請李柏曼教授於五月廿日發表「關於經濟利潤和誹謗」的談話，他說：何謂利潤？這就是剩餘產品的貨幣形式，剩餘產品是用勞動生產的，利潤超過生產者本身需要的那一部份的物質福利，新體制把這一部份物質福利用來解決社會上最重要的需要，例如用來擴大生產，用在教育、衛生保健方面，用來發展科學和文化，以及解決國防和管理方面的需要。

進一步，李柏曼說：「剩餘產品對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是像空氣那樣必需，但是必須知道，剩餘產品的價值，也就是以貨幣形式表現出來的利潤，無論如何不能稱為資本主義的利潤，因為它不屬於個別私有企業主，而是屬於整個社會」，「所以這個利潤，不是消耗在資本家的奢華生活方面，而是完全用在全體勞動者所必需的和重要的方面。」

最後，李柏曼在他的談話中提出：毛共宣傳經常把他當作一個復辟資本

主義的理論家，毛共的宣傳經常援引他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真理報」刊登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談到社會主義企業的利潤作用，但是這篇文章的題目是：「計劃、利潤、獎金」，毛共份子却故意的一字不提。

五、關於毛共的宣傳攻擊「物質鼓勵原則」，莫斯科的宣傳說，「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人與主人之間有其公開的矛盾」，「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這種矛盾是沒有的」，「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個人與社會的利益是一致的」。物質鼓勵原則是列寧提出的，列寧不認為革命全靠熱情，也需要有物質的鼓勵，所以他主張物質鼓勵與革命熱情結合起來。莫斯科宣傳認為對物質鼓勵和個人利益應有正確的理解：儘管每個人的利益各有不同，非常廣泛，但是滿足其中大部份的利益，取決於物質狀況，取決於所具有物質福利數量。為了吃好、穿好、享用文化成就，必須具備在勞動過程中能夠得到一定的資金；因為所謂個人利益，首先是社會每個成員努力改善自己的物質狀況，努力充分滿足自己的需求，希望通過有效的勞動，不僅得到精神上的滿足，而且也得到勞動者本身和他家人所必需的物質福利。莫斯科的宣傳強調說：「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者的個人利益與整個社會主義利益相符合，社會主義社會的利益是不斷發展生產、積累愈來愈多的公有財富，使其作為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重要物質前提。」

當然，除此之外蘇俄的回擊和表白還涉及到提高企業經營自主性、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等等，為篇幅所限祇好從略。

肆 結論

一九六五年九月俄共中央舉行全體會議討論經濟改革案的時候，柯錫金代表中央政治局報告本案內容，報告到最後，他說：

「本次全會的工作，毫無疑問將在國外得到巨大的反應。我們相信，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朋友素以最大的興趣追隨蘇俄的生活和經濟上的進步，他們將滿意的擁護全會的決定；但是，我們的敵人，自然要竭力歪曲這些決定的本質。」

「目前資產階級的理論家們，在聽到蘇俄準備經濟改革之後，就已經試圖將它刻畫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制度弱點的表现。資產階級的報刊在誇大實際缺點（多半是虛構的）的時候，說蘇俄的經濟如何如何「一塌糊塗」、「

資本主義復辟乎？經濟改革乎？」

有危機」，顯然，我們關於改進計劃工作和國民經濟領導的討論，在某些資產階級「蘇俄通」的腦海裏業已加以歪曲。我們是想知道如何把我們的工作做得更好一點，更充分利用社會主義的可能性，而他們像往常一樣，硬說我們的社會主義生產制度破了產，說蘇俄資本主義經營的立場在增強，說計劃的原則要自然而然的改為市場調節。」

柯錫金這幾句話，很可能被世界上大多數的人看成是針對西方一些經濟學人和政論家而發，其實了解柯慶這幾句之真意的，不是別人，而是共匪，他們將會首先注意到柯錫金所說「我們的敵人」這幾個字，因為他們不是柯錫金所說的「素以最大興趣追隨蘇俄生活和經濟進步」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朋友」，而是與蘇俄針鋒相對的「敵人」。

柯錫金在這一段報告中沒有提到共匪，祇是提到資產階級的理論家或資產階級的「蘇俄通」，這沒有什麼奧妙，說穿了同毛共一樣，先是對敵人採取間接的指桑罵槐的戰術而已。

我們很失望，在匪俄因蘇俄的經濟改革的互吠中，得不到一點新的東西。——毛共宣傳的攻擊，並不是採理論批判的方式，而是採王婆罵街的姿態，甚至於摭拾蘇俄報紙上自己揭露的缺點作為攻擊的根據；反過來，蘇俄的回擊與表白，仍舊是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以後和一九六五年九月俄共中央全會討論經濟改革案以前這段期間蘇俄報刊上翻來覆去的一些老調，最多也不過是以一九六六年的實施結果（此項結果的真實價值如何大可懷疑）證明此項改革「是及時的」、「正確的」、「受到勞動人民歡迎的」而已。

我們預料：匪俄之間關於經濟改革的互吠（委實無法稱為論戰）既已開始，在一個短時期內不會戛然而止，此種發展要繼續下去。不過，它們之間的互吠愈長，愈對毛共不利的趨勢是顯而易見的，因為蘇俄即便真如毛共宣傳所斥，是所謂「盧布掛帥」、「利潤掛帥」、「皮鞋加大衣的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復辟」，在一般人民看起來，要比毛共要求他們「在生產中爭取高水準」、「在生活中爭取低水準」好的多。總歸會有這樣一天，當毛共發現它們的攻擊起了反作用，對自已已形成一種嚴重的局面時，此項攻擊會在一夕之間普遍宣告停止。所以，當毛共流年不利，到處碰壁，事事都要受到挫折之時，在匪俄因經濟改革的互吠中也不能例外，最後的失敗者仍舊是毛共。